

基本经济制度探索:中国道路与治理效能

武汉大学改革开放研究课题组

(武汉大学国家发展战略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内容提要:道路问题的探索,贯穿了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全过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支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对其形成与发展进行了艰辛探索,走出了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改革道路。中国共产党在基本经济制度的改革探索中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通过走增量带动存量、局部带动整体的渐进式改革道路,实现了促进改革与维护稳定的有效兼顾,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结合起来,兼顾了效率与公平。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畅通内外经济循环,优化中国经济运行机理,多次创业创新创富浪潮孕育兴起,居民就业和收入极大改观。进入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新发展阶段,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持续深化各项改革举措。

关键词:基本经济制度 改革开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民营经济 共同富裕

中图分类号:F0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5766(2021)11—0005—11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开天辟地,到建立新中国的改天换地,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再到新时代的惊天动地,关于道路问题的探索贯穿了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全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中国能够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成功创造人类文明史上史无前例的发展奇迹,根源在于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阶段都没有盲目照搬外来模式,而是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不囿于教条化的思维定势,坚持走与国情相适应的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建立了新中国,没有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建构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框架,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基础,没有照搬苏联、东欧的模式;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开拓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没有照搬东亚模式和欧美模式;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通过艰苦奋斗全面消除了绝对贫困,为进一步推进共同富裕的实现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构筑了坚实的现实基础。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的统一(编写组,2021)^[1]。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经济制度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决定性地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支柱,是中国实现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基石。其改革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发展,在经济发展实现历史性跨越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回顾总结基本经济制度形成的历史脉络和理论逻辑,对进一步推动经济理论创新,更好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与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建党百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对基本经济制度的艰辛探索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充分认识到经济制度在社会制度中的决定性地位和作

用,初步形成了一些早期构想,当时推动经济工作的着力点在于“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毛泽东,1991)^[2],经济制度建设的着力点在于消灭剥削、让劳苦大众翻身解放,使中国人民能够真正当家作主,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1949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对人民共和国的五种主要经济成分进行了深入分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再次明确了多种经济成分的构成。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近30年采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符合这一历史时期内部百废待兴、外部面临敌对与封锁的基本国情的。这一时期的基本经济制度不仅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而且为我们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比较快地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提供了制度基础,积累起如何通过制度优化提高生产力水平进行经济建设的重要经验。辩证地看,这一期间的经济制度使中国取得了许多巨大成就,激发了经济潜能,稳定了经济秩序,为后来的制度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但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也制约了经济效率与活力,使“富起来”受限。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探索迎来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转折。中国共产党遵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原则,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开启了全新的探索历程,具体体现为更加重视通过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多元化收入分配方式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克服平均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每次党的代表大会在所有制等基本经济制度问题上都有新的理论突破。十二大提出,把个体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十三大明确提出私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标志着党开始认识到多种经济成分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采取稳妥、有限度的政策支持(辜胜阻和韩龙艳,2017)^[3],继而从经济制度内部培育出了多种新的所有制成分。在分配制度方面,首次提出“其他分配方式”作为按劳分配这一主体的补充;在经济体制方面,提出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观点。对原有僵化的所有制结构的突破,有效地激发了分配方式变革的内在动力,并进一步推动了以市场化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步伐。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提出“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编写组,2021)^[4],进一步扫清了在改革所有制问题上的理论障碍,从根本上摆脱了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的争论。邓小平经济改革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将市场经济的“基因”植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而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更有效率的经济体制。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明确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十五大正式明确“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演变为内在的“重要组成部分”,首次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外”纳入到“体制内”。在分配制度方面,提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进一步实现了分配制度的重大突破。十六大提出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并强调两者“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同时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十七大提出要“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表明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着力点在于构建不同所有制经济公平发展的环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20)^[5],从法律上的“平等”保护和经济上的“平等”竞争两方面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十八大提出“保证各种所有制

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在十六大强调在生产要素和市场机遇方面应当对各种所有制经济“一视同仁”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各种所有制经济在法律层面的平等地位。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强调“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首次明确将知识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明确提出“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十九大把“两个毫不动摇”写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行统一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在分配制度方面，特别提出要建立“由市场评价要素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分配机制，进一步明确土地和数据要素参与分配，顺应了数字经济发展的演进趋势。

在生产关系问题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中，所有制的制度安排是最重要的基础问题，是分配关系的决定条件，是经济体制形成与完善的重要前提，是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石。所有制结构调整与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两条主线，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构筑了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基础，而市场化改革则进一步使各种所有制经济的活力竞相发展（张卓元，2018）^[6]。基本经济制度在探索 and 实践中不断成熟和完善，极大改变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貌，在经济制度方面实现了三大转变：在所有制方面，从单一公有制转向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在分配制度方面，从平均主义分配、单一按劳分配转向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在经济体制方面，从计划经济转向了市场经济，实现了市场经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相容共生。三项基本经济制度紧密结合、互为支持、有机协调，对经济制度属性和经济发展方式有决定性影响。

二、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探索走的是富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改革道路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从实践探索提升理论认识，又从理论突破进一步指导实践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党深刻总结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经验，以巨大的政治勇气主动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对经济制度改革进行了一系列深刻的创新探索。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在游泳中游泳”，试错、容错、止错、纠错，不仅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而且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苏联和东欧国家，也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

——在基本经济制度的探索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苏联模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所有制形式上盲目追求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强调国家所有制成分发展的绝对地位，限制其他经济成分的发展；在经济体制上则忽视客观经济规律，实行自上而下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压抑了微观主体的生产主动性与创造性，影响了各类市场主体经济决策的有效性。经典的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过于强调了所有制成分的纯粹，忽视了分配方式对生产积极性的决定性影响，不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承认全方位对外开放是属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内涵。历史充分证明，对于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发展不平衡的大国来说，生产关系总是复杂多样化，纯而又纯的生产关系和僵化的经济组织形式将对经济体自身的良性运转和长效发展产生严重桎梏。生产生活需要稳定且丰富的供给体系，社会需求也是多元化的，不能靠单一的经济成分、单一的所有制来“包打天下”（谢鲁江，2018）^[7]，僵化的分配制度也无法让发展成果为更多人所共享，只会压抑人民创新创业创富的积极性。中国共产党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改革魄力，克服各种阻力和困难，通过所有制变革打开改革缺口，以分配制度的改革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变革为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

放以来,我国 GDP 年均增长率是世界同期年均增速的 3 倍多,国内生产总值从 1978 年尚不足 4000 亿元到 2020 年首度突破 100 万亿元大关,从 1978 年相当于同期美国 GDP 的 6% 的水平跃升至 2020 年 70% 的水平,经济增长速度和总量超过绝大多数国家(如图 1 所示),人均 GDP 超过 1 万美元。基本经济制度的探索在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发挥了极其关键的作用(黄群慧等,202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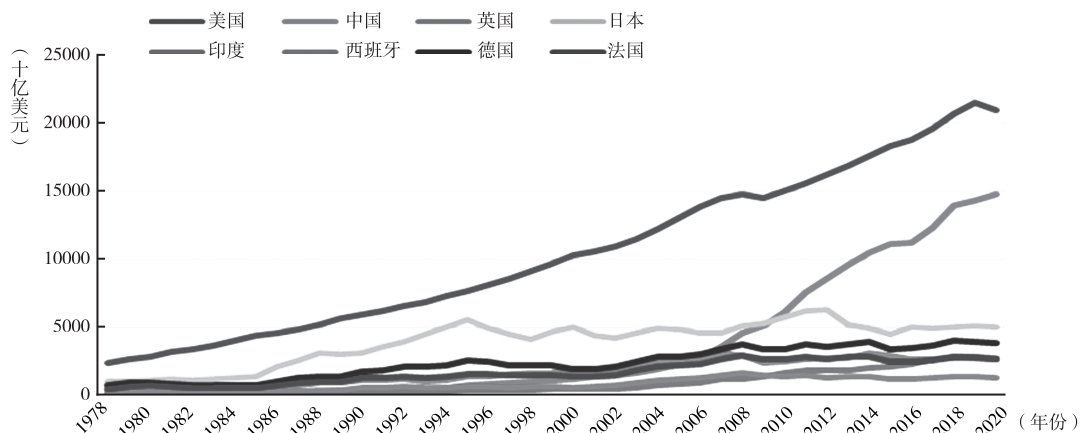


图 1 世界主要国家 GDP 增长趋势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走“以增量带动存量、局部带动整体”的渐进式改革道路,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使改革和发展取得了富有成效的成果。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兴起了一轮深层次的转轨浪潮。在转轨方式的抉择上,许多前社会主义国家选择了激进式的改革方案,在经济上采用“休克疗法”,在政治上实施“激进转型”,结果导致一段时间内经济政治秩序陷入混乱,政府调控失效、市场机制失灵,对经济体系造成严重伤害,使得人民生活水平短期内急剧下降,带来了两极分化严重等“后遗症”。合理地改革部门进行分解是改革分析模式的关键所在,中国改革的部门结构是公有制经济部门和非公有制经济部门组成的二元化结构,呈现一种“双轨制”的改革逻辑。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改革之所以能够在规避不可控动荡的前提下获得成功,最重要的经验是在维护原有体制稳定的同时培育和发展出一种新的体制,走出了一条以“增量改革先行”为表征的发展道路,形成了体制内和体制外并存、维护稳定的体制内部门和具有活力的新的增长点同时存在的局面。这种以增量改革促存量改革的方式能够避免过高的调整成本,使改革即时获益,取得人民对改革的全力支持(武汉大学改革开放 40 年模式研究课题组,2019)^[9]。40 多年来,民营经济既为民又富民,既兴国之裕国,在发挥基本经济制度治理效能、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民营经济贡献了我国 50% 以上的税收和出口、60% 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发明专利、70% 以上的新产品、80% 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存量和专利占比、90% 以上的企业数量及城镇及营业增量^①,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如表 1 所示)。没有基本经济制度就没有民营经济的蓬勃兴起;没有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富起来”就难以实现。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是基本经济制度改革与发展之路中最成功、最有效的增量改革成果,又是推动基本经济制度焕发强大效能的重要力量。民营经济发展作为一种增量突破,使市场力量从外向内,“倒逼”体制内加快改革,盘活原有各类国有企业,形成国企、民企相互竞争而又共同发展的格局。历史雄辩地证明,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民营经济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一定是中国走向现代化强国之路不可

① “56789”,民营经济有“分量”,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comments/2019-03/09/c_1124214167.htm。

替代的重要力量。可以说,民营经济活则新发展格局活,民营经济兴则中国经济兴,民营经济强则中华民族强。

表 1 民营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份额

市场主体和 微观经济基础	科技创新			开放格局		商品和服务供给			居民就业和收入		
	专利 占比	发明专利 占比	新产品 占比	出口 占比	海外投资 存量占比	日用消费 品占比	中高消费 品占比	生活消费 服务占比	城镇就业 存量占比	城镇就业 增量占比	提供 收入
市场主体 企业法人占比	80%	60%	70%	50%	33%	80%	60%	75%	80%	95%	3 亿人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部门统计资料整理

——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结合起来,在增强市场活力的同时也实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效能。在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过程中,实现了把有效的市场机制和有度的宏观调控结合起来。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10]。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打破了政府和市场的二元对立,提出“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改革目标,通过明晰定位、转变职能、规范行为,推动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释放了市场活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有为政府,是改革开放后中国能够在当时的情势下培育起市场体系的逻辑起点,通过政策红利的释放促进了市场主体活跃发展,并通过有力、有效的宏观治理进行经济调控,修正了市场机制对经济调节的偏误,保障了宏观经济长期稳定(卢福才和王守坤,2021)^[11]。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运作机理有力保障了宏观调控的有效性,使市场遭遇“失灵”时可以及时纠偏。通过脱贫攻坚战及长久的减贫实践,全面消除了绝对贫困(如图 2 所示),将政府高效组织动员能力与依靠市场机制形成贫困地区内生发展动力结合起来,创造了世界减贫史上的伟大奇迹。政府组织调动大量资源用于农村减贫和支援中西部落后地区发展,对缩小小城乡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和缓解收入两极分化起到了显著的积极作用。民营企业等市场主体也在减贫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了先富带动后富的生动实践。根据全国工商联的统计,截至 2020 年底,累计有近 13 万家民营企业投身脱贫攻坚战,帮扶近 14 万个贫困村,产业投入 1100 多亿元,公益投入 160 多亿元,为 1800 余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摆脱绝对贫困做出积极贡献。基本经济制度安排还能够使在经济体系遭遇外部冲击时保持韧性,避免“大起大落”。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我国为保障人民生命健康承受经济停摆的巨大代价,在市场几乎失灵的情况下保障重点物资和服务的充分供应,采取强有力举措抑制了重点物资的价格脱离使用需求。在疫情平复后,又及时出台“六保”“六稳”措施,加快推进复工复产,帮助各类市场主体恢复“元气”。

——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改善了人民生活,不断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畅通了经济的内外循环。改革开放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变革了农业剩余索取权的分配方式,改变了农业长期低产低效的状况,我国的粮食生产总量在短短数年内大幅度提升,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不断提升,收入水平持续增长。各种所有制的经济成分能够各展所长、优势互补,形成若干相对独立的利益单元和决策单元。因为市场信息能够更加真实和充分地反映到经济循环的各个环节,各类微观经济主体能够自发地优化其经济决策与行为,优化了各种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从而使经济体系能够高效有序运转,并持续实现帕累托改进。中国单一的所有制格局变迁,是通过内部培育新的经济成分和引进外资的外部嫁接这样一种内外结合的双重路径实现的(方福前,2021)^[12]。国门的开放有效地帮助了中国企业引进吸收国外先进技术、设备与管理经验,也推动了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等上层建筑的变革,这反过来又为进一步推动开放创造了条件,改革的深化与开放水平的提

升进入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没有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中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度增长和高质量发展就无从谈起。知识、技术等要素参与分配激发了创新动能,极大推动了生产力发展,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已经连续 8 年排名世界第一,2020 年科技进步的贡献率超过 60%^①。40 年多来、特别是近 20 年来投资的高速增长,各类型经济成分均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贡献最大的是民间投资、民营企业投资。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国的国有经济部门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所占的份额超过 80%,个体私营部门的份额刚刚超过 10%,近年民间投资占比连续多年达到 60% 以上。多种经济成分的共同繁荣发展,也有效推动我国更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更好地共享全球化红利,并且极大提升了中国经济在全球范围的影响力。对外贸易是中国经济实现长期高速度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对外贸的贡献度十分可观。特别是民营企业已经成为拉动我国外贸发展中占比最大的经济成分、最活跃的力量,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依然展现出很强的韧性,成为稳外贸的重要力量。据海关统计,2020 年民营企业进出口 14.98 万亿元人民币,进出口同比提升 3.9 个百分点,占我国外贸出口总值的 46.6%。商务部 2021 年 9 月最新统计表明,民营企业出口占比已经进一步提升至 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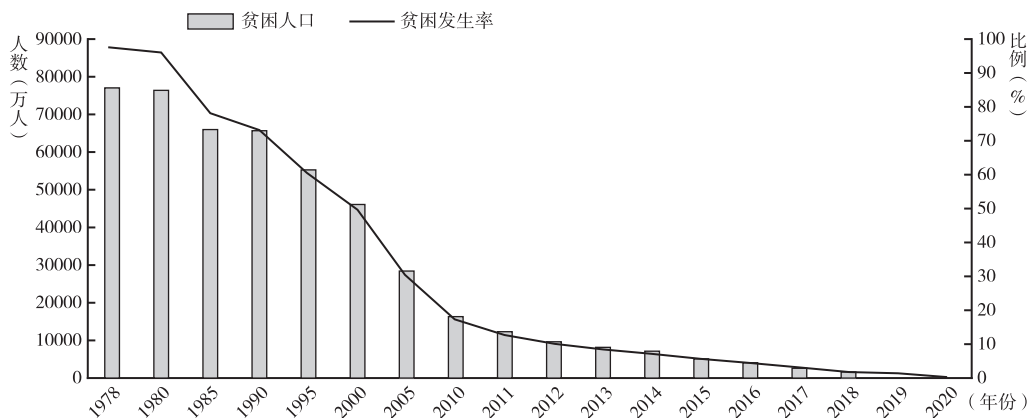


图 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减贫治理成效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农村监测报告》

——带动形成了创业、创新、创富的“金三角”，推动了一波又一波的创业浪潮，崛起了一批又一批企业家群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仅实现了物质财富的高速增长,更重要的是出现了四波大的创业浪潮(辜胜阻,2016)^[13],新的社会阶层崛起,塑造了一代又一代企业家。第一次创业浪潮发生在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主要特征是“草根创业”。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开始逐步放宽,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为第一次创业浪潮形成创造了历史机遇。当时中国社会处于物资极度贫乏的年代,大批知识青年返城创业,城市边缘人群和农民开始创办乡镇企业,涌现出许多个体户、万元户。1992 年邓小平南巡以后开启了以“科技精英”“政治精英”等精英人群下海经商为特征的第二次创业浪潮。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正式成为 WTO 成员,加速融入全球经济,伴随着互联网新经济和风险投资及资本市场的发展,以互联网新经济为特征的第三次创新创业浪潮蓬勃兴起。第四次创业浪潮就是十八大以来的创新创业浪潮。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大力推行简政放权,对双创出台一系列引导措施。新时代的创新创业范围更大、层次更高,创新成为“双创”的主要推动力,新一轮科

^①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全面支撑新发展格局”新闻发布会[EB/OL]. <http://www.scio.gov.cn/xwfbh/xwfbh/wqfbh/44687/44975/index.htm>.

技革命孕育兴起,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快速发展,创业与创新联动更加紧密。“双创”主体多元化,既有视野开阔的海归人员,也有农民工“草根”创业,还有大量富有创造活力和干事激情的大学生群体,以及体制内的管理精英和科技人才。“双创”体系生态化,顶天立地的科技大企业和铺天盖地的小微企业共生共荣。“双创”高度网络化,互联网发展为线上与线下共创众创提供技术保障。“众创”“众包”“众筹”等新的商业模式、管理机制、投资模式多维度创新交相呼应(辜胜阻和李睿,2015)^[14]。企业家精神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宝贵资源,企业家对生产活动的决策判断与组织行为,是推进技术进步和生产方式优化的关键,可以促进社会资源要素实现最优配置,并通过探索新的市场机遇,拓宽和引领潜在需求。企业家群体也是落实财富合理分配的重要力量,在解决就业、提高居民收入中十分重要。

创业、创新、创富“金三角”的形成不仅表现在国民经济中发挥支柱性作用的大企业崛起,更有无数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茁壮成长。我国个体工商户在改革开放前期只有十多万。2018年末,我国已有超过1800万家中小微企业法人单位,其中小微私营企业有1526.5万家,2021年个体工商户数量已突破1亿户。“铺天盖地”的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是典型的“老百姓经济”,是民有、民营、民享的民本经济,让人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和所掌握的资源要素来创造财富,实现了藏富于民。

表 2 不同所有制的就业结构 单位:%

年份	就业总计 (万人)	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有限责任 公司	股份有限 公司	私营企业	外商和港澳台 投资企业	个体
2005	28389	23	3	6	2	12	4	10
2006	29630	22	3	6	3	13	5	10
2007	30953	21	2	7	3	15	5	11
2008	32103	20	2	7	3	16	5	11
2009	33322	19	2	7	3	17	5	13
2010	34687	19	2	8	3	18	5	13
2011	35914	19	2	9	3	19	6	15
2012	37102	18	2	10	3	20	6	15
2013	38240	17	1	16	5	22	8	16
2014	39310	16	1	16	4	25	8	18
2015	40410	15	1	16	4	28	7	19
2016	41428	15	1	15	4	29	6	21
2017	42462	14	1	15	4	31	6	22
2018	43419	13	1	15	4	32	5	24
2019	44247	13	1	15	4	33	5	26

注:因股份合作单位和联营单位的历年就业占比不足1%,表中没有呈现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20)

——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就业格局,提高了居民收入水平,更好地满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就业格局的变迁和收入水平的增长,是基本经济制度的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厚植人民性的重要体现。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赋能了劳动力资源配置,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使居民就业渠道逐步拓展,分配制度的优化使得财富分配方式更加多元,劳动力资源配置转向了市场机制主导、政府发挥宏观调控和安置兜底功能的模式。这不仅提升了就业总量、丰富了就业形态、优化了就业结构(如表2所示),也推动了各类产业的发展,扩大了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总量与多样性。改革开放以后,大量企业特别是非公有制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产生了庞大的用工需求,在非公有制经济部门的就业人数持续增长。中国的劳动力配置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几亿“沉淀”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被“解放”出来,进入城镇和二、三产业,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极大地优化了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民营企业成为吸纳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城就业的主力,对促进农民就业增收,促进共同富裕发挥了重要作用。《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有农民工2.856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969亿人,农民工人均月收入4027元,他们大多数都在民营企业就业,或成为城镇个体经营户。从2020年城镇就业存量来看,民营企业的就业人数达到了80%,对就业增量的贡献则更是超过了95%。外资企业的数量仅占中国市场主体数量的2%,带动的就业约4000万人。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连年上涨(如图3所示),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2020年上涨了180多倍,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连续13年平稳下降至2.56。农民不仅可以通过务农获得收入,还可以根据自主意愿和能力从城镇以及工业、服务业部门兼业获得更多报酬。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已达4亿人之上,而且还在较快地增长。财税调节是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要的一个重要宏观措施,从2020年全国税收缴纳情况来看,民营经济的份额首次超过了60%的水平,在保障税收水平稳定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完善再分配调节机制的重要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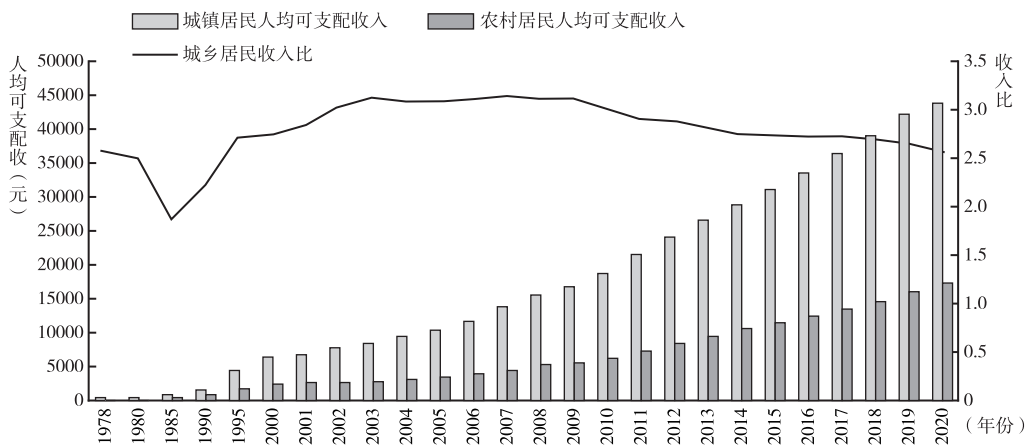


图3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比

资料来源:农业农村部《中国农业农村经济简况》

三、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在新征程上要“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在走向“强起来”的征途中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将基本经济制度优势转化为经济治理的显著效能。民营企业既深度参与和极大受益于促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也是未来深入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实践主体。广大民营企业要“向上”,不能“躺平”,把握好共同富裕带来的广阔舞台和市场机遇;

要“向善”，蹄疾步稳实现健康发展，努力成为促进共同富裕的市场中坚力量，更好肩负起时代重任。

(1)要处理好“先富”与“共富”关系，发展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共生共荣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形成国有投资与民间投资的合力，循序渐进推进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帮后富，重点鼓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从发展实践看，虽然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阶段性发展不是完全同步的，但人们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都得到了显著提升，各行业各地区都成为了基本经济制度改革与发展的受益者。实现共同富裕是动态发展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或者齐头并进。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要对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有充分估计，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做到分类指导、精准施策，通过改革示范探索有效路径。要重点鼓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支持先富带动后富。把显著缩小城乡差距放在更加突出和优先的位置，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城乡全面融合，实现城乡共建共享，坚定不移地走城乡共同富裕之路(魏后凯,2021)^[15]。要鼓励民营企业积极参与乡村振兴和现代农业建设，因势利导新一轮返乡入乡创业潮，发展农业农村的自我雇佣经济和草根经济，以创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先富”的“关键少数”带领“绝大多数”走向“共富”。把握人口和产业向中西部“双转移”的趋势，引导民营企业到中西部地区投资兴业，助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欠发达地区更好共享发展成果。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可以丰富民营企业的发展机遇，释放民间投资活力；通过多种经济成分混合“杂交”优势，实现不同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有利于充分发挥国企创新发展优势，利用创新溢出效应带动全产业链企业发展，为打造更多具有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的企业(辜胜阻,2017)^[16]。

(2)要营造“实业能致富，创新致大富”的环境，构建“亲”“清”政商关系，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鼓励勤劳致富和创新致富。幸福生活都是奋斗出来的，共同富裕要靠勤劳智慧来创造。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经济建设的辉煌成就，归根结底是全体人民用勤劳和汗水、智慧和勇气、改革和创新奋斗出来的。新的征程上，共同富裕需要共同建设、共同创造、共同奋斗，必须脚踏实地、久久为功，紧紧依靠人民，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努力、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改革开放史强有力地证明了民营经济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生力军，顺应了人们自主谋求发展的行为理性和利益诉求，是符合经济规律的共同富裕路径选择(张菀洺和刘迎秋,2021)^[17]。政府要为民营经济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从市场准入、营商环境、减税降费、转型升级、技术创新和金融服务等方面为民营企业纾困解难，促进民营企业更好发展，增强民营企业吸纳就业、稳定就业的能力。要推动各类所有制性质企业之间在更高水平和更高层次实现协同共生、互利合作，营造更加良性的竞合生态(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所课题组,2020)^[18]。鼓励创新创业，要构建亲清政商关系，重构清廉正派意识，让官商不再“无畏”；进一步激励干部积极作为、靠前服务、平等服务，让官员不再“无为”；稳定企业家预期、提振企业家信心，重构守法诚信价值体系，让企业不再“无力”。

(3)要在按多种要素参与分配中处理好由市场评价贡献、由贡献决定报酬的关系，完善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推动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要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通过多种方式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继续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使一次分配更有效率，激发各类要素的创富属性，让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充分涌流，使各类要素的致富创富活力竞相迸发。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大税收、社保和转移支付制度等措施的精准度，提高二次分配的公平性，健全税收制度及

征管体系,增加个人所得税累进效应,加大消费环节税收调解力度,加快推进房产税等财产税制度的研究和立法。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畅通向上流动通道,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鼓励各类社会群体自觉自愿履行社会责任,发展社会慈善事业,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的济贫救困功能。要培育更多慈善组织,优化促进慈善组织健康发展的制度设计,强化财税政策的引导激励功能,提升运营过程的透明化程度。

(4)要发挥企业家作为“关键少数”和特殊人才在实现共同富裕中的积极作用,进一步激发企业家精神,继续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市场活力来自于人,特别是来自于企业家,来自于企业家精神”。要进一步营造宽松的发展环境和尊重企业家的社会氛围,鼓励冒险、宽容失败,发展壮大企业家队伍。企业家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养分,将“义利兼顾”贯彻到企业经营管理实践全过程。要加强对企业家的教育和培训,提升企业家的经营管理才能和创新创业素质,特别是要支持企业家精神的传承,培育和塑造更多新生代企业家群体。以市场主体需求为导向深化“放管服”改革,通过改善营商环境、确保规则公平,减少对经济活动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和政策的不确定性,着力稳预期、强信心。要进一步完善产权制度,强化法律保障,保护民营企业家的合法财产、创新权益和经营自主权,让“有恒产者有恒心”,让企业家有“安全感”和“方向感”。

参考文献

- [1]编写组. 社会主义发展简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 [2]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3]辜胜阻, 韩龙艳. 中国民营经济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J]. 北京: 求是, 2017, (7): 33-35.
- [4]编写组. 改革开放简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 [5]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 “十四五”时期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变化趋势及优化政策研究[J]. 北京: 经济动态, 2020, (3): 3-21.
- [6]张卓元. 中国经济改革的两条主线[J].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 2018, (11): 12-29.
- [7]谢鲁江. 从基本经济制度高度认识民营经济重要地位[N]. 学习时报, 2018-12-19.
- [8]黄群慧, 平新乔, 李实, 洪永森.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笔谈[J]. 北京: 经济动态, 2021, (8): 3-16.
- [9]武汉大学改革开放40年模式研究课题组. 中国40年改革开放模式的八大特征[J]. 北京: 新华文摘, 2019, (5): 24-26.
- [10]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 人民日报, 2013-11-16.
- [11]卢福财, 王守坤. 历史脉络与实践视野下的有为政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命题[J]. 北京: 管理世界, 2021, (9): 77-90.
- [12]方福前. 从单一公有制到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中国共产党对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和结构的百年探索与实践[J]. 北京: 中国工业经济, 2021, (8): 5-19.
- [13]辜胜阻. 以制度供给引领“双创”蓬勃发展[N]. 学习时报, 2016-06-02.
- [14]辜胜阻, 李睿.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要激发多元主体活力[J]. 北京: 求是, 2015, (16): 28-30.
- [15]魏后凯. 实现共同富裕需显著缩小城乡差距[J]. 北京: 财贸经济, 2021, (8): 5-19.
- [16]辜胜阻. 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需激发民企活力[N]. 中华工商时报, 2017-11-01.
- [17]张菡洳, 刘迎秋. 开拓政治经济学中国话语新境界——中国民营经济理论的创新发展[J].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 2021, (6): 77-97, 205-206.
- [18]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 我国多种所有制企业共同发展的时代内涵与“十四五”政策措施[J]. 北京: 经济管理, 2020, (6): 5-24.

Exploration of the Basic Economic System : China's Road and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Research Group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Wuhan University

(National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rateg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China)

Abstract: The exploration of the road has run through the process of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past 100 years. The basic socialist economic system is an important pillar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ed the Chinese people to arduously explore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basic economic system, and embarked on a path of refor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basic economic system has matured and improved in the course of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which has greatly changed the outlook of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ree major changes have been made in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The ownership system has shifted from a single public ownership system to a public ownership system as the main body, and multiple ownership systems develop together. The distribution system shifted from egalitarian distribution and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work to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work as the main body and coexistence of multiple distribution methods. The economic system has shifted from planned economy to market economy, realizing the symbiosis of the market economy and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three basic economic systems are interrelated, mutually supportive and mutually reinforcing, and have a decisive influence on the attributes of the economic system and the mod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exploration of the reform of the basic economic system combines Marxism with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rather than copying the model of other countries. Taking incremental reforms first, we have embarked on a gradual reform path in which incremental reforms drive the stock market and partial reforms drive the whole. Under the premise of maintaining stability,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have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 Among them, the private economy is the most successful and effective reform achievement. The combination of a well-functioning market and an effective government not only enhances market vitality, but also realizes the system efficiency of "concentrating resources to accomplish great tasks", and gives consideration to both efficiency and equity. The improvement of the basic economic system has liberated and developed productive forces, unblocked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economic cycles, and optimized the operating mechanism of China's economy. With the reform of the basic economic system, waves of entrepreneurship, innovation and wealth creation have nurtured, and generations of entrepreneurs have emerged. China's employment pattern has undergone profound changes. The employment status and income of residents have greatly improved, which has promoted the process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the people's ever-growing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have been met. Entering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of building a modern and powerful country, we must adhere to and improve the basic economic system and continue to deepen various reform measures for the purpose of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It is necessary to proper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tting rich first" and "getting rich together", develop a mixed ownership economy in which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coexist and prosper together, and form a joint force of state-owned investment and private investment. We need to create an environment where the real economy makes people rich and innovation makes great wealth, and build a proper political-business relationship, encourage more social entities to devote themselves to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nd encourage hard work and innovation to get rich. It is necessary to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ket evaluation contribution and contribution decision remuneration in participating in the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multiple factors. We need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positive role of entrepreneurs as a "key minority" and special talents in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further stimulate entrepreneurship, and continue making the cake bigger and dividing it well.

Key Words: basic economic system; reform and opening-up;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rivate economy; common prosperity

JEL Classification: D21, O32, Q58

DOI: 10.19616/j.cnki.bmj.2021.11.001

(责任编辑:刘建丽)